

依靠群众和全社会力量培育好下一代 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在京成立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最近在北京成立，康克清任会长，朱学范、华罗庚、荣高棠、胡乔木、谢冰心等任副会长，沈粹缜、庄明理、吴雪、杜廷芳、杨肇清、卓卓玉等为理事。儿童和少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后备大军，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抚育、培养、教育儿童和少年是一项社会事业，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办好。许多热心人士纷纷表示愿为培育下一代出力出钱，作出贡献。为了妥善进行和合理安排这项工作，由中国福利会、

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文联、中国科协、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全国侨联、全国工商联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基金来源由个人捐赠，以及企业、军队、机关、团体等单位的集体捐赠。基金会也接受个人或集体捐赠的物资。基金将直接用于儿童和少年必需的活动设施，并尊重捐赠者的意愿。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的帐号是：中国，北京，中国人民银行东西南分理处8901—201。



振兴农业的新课题

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是发展我国农业的新课题。我国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商品生产不发达。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面临着两个极其现实的问题：一是怎样筹集资金，用现代技术武装农业；二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后，怎样为剩余劳动力找出路。资金问题，由于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依靠国家拿出很多投资和贷款；让大批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此路不通。最切实可行的做法，主要是靠农村集体经济的力量，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充分挖掘资源、劳力的优势，发展多种经营，并在生产、加工、销售方面实行经济联合，密切三者的经济联系，加快农业自身的积累。

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要求农、工、商协作，产、供、销衔接，协调发展，以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过去，工业在城市高度集中，农产品要运到远离产地的工厂加工，使大量作饲料和肥料的剩余副产品，不易返回农村，重新用于农业生产；同时，人口大量集中到城市，也造成了大城市的畸形发展，扩大了城乡差别。这不利于工农互相提供物质资料，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走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这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不会把农村，瘦了国营工业，挤了国营商业呢？农村长期处于单纯提供原料的地位，农民只能务农，不准务工，不准经商，产供销脱节，流通渠道单一，使得农民只能“贱卖贵买”，这是很不合理的。为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就要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各地创办的社队企业以及农工商联合企业的试点说明，只要统筹安排得当，国营企业不会受害，国家财政收入明显增加，是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大“锅”里添加了米，而不是把锅里

原有的米抢去吃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为加快农业的发展，要求国营农业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在经营农业的同时，根据当地农副产品、自然资源和资源条件，经营工业和商业，逐步向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方向发展。两年多来，各地进行了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试点，取得了不少好的经验。概括地说，在联合组织的较大范围内，调整了生产结构，冲破了统得过死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生产发展，商品率提高，流通渠道增多，农村市场活跃了，农民收入增加了。当前，随着党的各项农村经济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进一步落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村的多种经营日益发展，如何改革原有农业经济体制，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问题，日益紧迫地摆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必须因势利导，抓紧试点工作，进一步取得经验，推动这项事业健康发展。

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形式，要同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灵活多样，逐步由小到大，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目前有几种形式：横向的联合，即农业部门的几个企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综合体，进行农工商综合经营，也有在的不同企业之间就某个环节实行专业化的单项联合；纵向的联合，即工商几个部门的企业联合起来进行综合经营，形成产销一条龙。这里有松散的联合，如只签订某项合同；有固定的联合，如组成合股企业。这种联合不受行政区划、所有制性质和不同行业的限制。各地已经办起来的社队企业，可以说是农工商综合经营的一种初级形式。它的特点是社队为单位，跳出单一经营农业的框框，小型多样，上马较快。以上各种形式，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当时的条件进行选择，不拘一种模式。

(下转第四版)

赵紫阳坐民航班机从穗回京

万里、姬鹏飞、杜星垣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中午坐民航班机从广州回到北京。

赵紫阳总理是在圆满结束对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的正式友好访问之后，于8月13日从曼谷回到广州的。他在广州逗留期间，曾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姬鹏飞，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到机场迎接。

赵紫阳总理的随行人员外贸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国务院副秘书长陈楚已先期从广州回到北京。他们今天也到机场迎接。到机场迎接的还有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以及新加坡驻华商代表处的官员。赵紫阳离开广州时，广东省、广州市党政军负责人和广州部队负责人任仲夷、吴克华、刘田夫、王猛、梁灵光、李坚真等到机场送行。



王崇伦卖菜 王崇伦在哈尔滨道里市场商店帮助卖菜，了解市场蔬菜供应情况。 新华社记者 胡伟摄

通力合作 刹住长风

消息只写“最”

消息要短，大家都赞成，但就是写不短。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出于记者善良愿望，总想尽可能让读者多了解一些事情，但就是没有考虑到读者是否愿意看，是否有时间看。二是在采访写作时没有抓住要害。

要使消息短，除了要树立群众观点外，我以为，要紧的是一要删一个“最”字，即消息只写“最……”，如最新、最重要、最动人、最富有特色、最能为群众所关心、最能说明问题等等。当然这不仅是写作问题，更重要的是采访中如何判断的问题。为了判断哪些东西是

短不易

短而实的好新闻，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写长文更难。因为短新闻必须选择最近发生的有新闻价值的事实。不深入采访，不熟悉党的政策和群众生活，缺乏新闻敏感，就抓不住短新闻所要反映的内容。从写作看，以短的篇幅容纳较多的内容，选用材料要以一当十，语言要精炼、准确、生动。没有认真的态度，不懈的努力，是很难办到的。记者阎吾写《战后凉山》，只用三百多字，但所花费的脑筋不亚于写一篇大通讯。

短不易，切勿小看短文！ 吴鸿业

幅容纳较多的内容，选用材料要以一当十，语言要精炼、准确、生动。没有认真的态度，不懈的努力，是很难办到的。记者阎吾写《战后凉山》，只用三百多字，但所花费的脑筋不亚于写一篇大通讯。短不易，切勿小看短文！ 吴鸿业



一杯与一缸

一勺白糖，化入一杯开水，入口清甜，人们可以一饮而尽。同是一勺白糖，倘要投入一缸水中，喝上十天半月，难得出甜味来。人民日报重新刊登胡乔木同志《短些，再短些！》一文，并发表短评，要求刹长风、兴短文，不仅反映了广大读者

记者、编辑应带头刹长风 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胡乔木同志《短些，再短些！》一文，反映了广大读者的呼声。对当前报纸上的长风，很有必要。打开报纸，长文的比例确实相当大。这里有个情况应特别引起重视，即报上发表的长新闻和通讯，大多数是记者写的。尤其是一些名记者，他们的文章，少则半个版，多则一个版，甚至还要特文、长文、长新闻。教育者应首先受教育。刹长风、兴短文，记者应身体力行，给广大读者作出好样子。一些长文往往被放在版面突出的地位，偏有醒目的标题，而一些短小、但是，常常受到冷落，放的目标不明确，希望编辑克服长文短的思想，下功夫删繁就简，不要轻易给长文开绿灯。

的强烈呼声，也是切实变革开长会、作长报告等风气的先声。这是时代的需要。奋力实现四化的民族与人民，必须要有好的精神风貌，要紧张、要精炼，去拙查、去繁。尊敬的作者同志们，您有一勺白糖要奉献给读者吗？为了他们愿接受、能接受，请您将它化入一杯水中，千万别舀来一大缸！ 北京工业学院 阮宝湘

重庆长江农工商联合公司有新发展

本报讯 记者唐祖馨报道：重庆市长江农工商联合公司经过两年多的发展，生产和经营农副产品和加工产品已成为满足城市市场需要的重要补充。现在，这个联合公司的牛奶已占全市供应量的80%，柑桔占70%，茶叶占20%。这个作为农业体制改革试点的联合公司，最初是以市郊26个生产奶、果、鱼、茶等的国营农场为依托，以发展食品工业为主建立起来的。两年多来，这个公司由国营农场自身实行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纵向联合，逐步扩大到与农村社队的横向联合。现在，已有23个生产场（和四个县分公司、两个专业公司）五十多个加工厂（车间）和50个商业网点。同时与800个生产队实现经济联合，与邻近五个专区的一些生产单位开展了跨地区单项产品联合，与全国十几个省、市的一百多个单位发生了经济联系。柑桔、牛奶、茶叶和鱼四个主产品已形成四个专业联合体。市郊26个国营农场过去由于进行单一的农业原料生产，经济收入低，长期处于亏损状态。1979年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后，变为生产和销售成品和半成品，当年即盈利一百七十多万元，为这些农场办场二十多年来盈利总和的三倍多。

联合公司发挥了综合经营的优势，加强了与各方面的经济联合，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1980年，农业由上年的亏损58万元转为盈利45万元，工业利润比上年增长25%，商业利润增长55%，总利润达到三百八十五万多元，比上年增长一倍多。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

空军领导机关任命 黄植诚为某航校副校长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驾机起义归来的原国民党空军某飞行考核官黄植诚，已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航空学校副校长（副师职）。今天上午在空军领导机关和直属部队欢迎黄植诚起义归来和宣布任职命令大会上，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宣布了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关对黄植诚的任命。

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北仓库 整顿企业内部治安查出个盗窃集团

主犯仓库保管员高德才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 据新华社天津8月19日电 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北仓库，最近在整顿企业内部治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中，查出一个与社上的投机倒把分子相勾结的盗窃集团，主犯仓库保管员高德才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据查，1979年以来，这个盗窃集团从偷拿零散出口商品，发展到与社上

的投机倒把分子相互勾结，合伙盗窃。两年多来，他们乘工作之便，成箱成批盗窃出口商品和物资，低价倒卖。据初步统计，这个集团共盗出的瓷器等物，价值达4,000余元，其中仅高德才一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即达2,500多元。从去年以来，库存商品被盗和破碎的就达四万七千七百多件，价值二万七千多元。

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中滩公社，位于黄河北岸，土地肥沃，灌溉方便，自然条件好；可是，由于“大锅饭”式的经营，长期贫困落后，成了“三靠社”。1980年，这个公社实行“大包干”的经营管理方式，很快地摆脱了穷困的状态。这一变化，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中滩公社发动群众，从当地实际出发，本着促发展生产，利于巩固集体经济，利于社员和国家的精神，宜统则统，宜分则分，找到了一些解决新问题的办法。

概括起来就是解决了下面的十个怎么办：
一、耕畜如何饲养、管理和使役？他们从便于使役又利于保护集体财产出发，采取“作价分给社员，交户管理使役”的办法，由社员民主讨论评定，作价略低于市场价格。社员分到耕畜后，可以调换更适用的耕畜。但卖出一头，必须买进一头，不能低于卖出的价格。新的牲畜未买进之前，畜款要存入银行，不得挪用。现在耕畜的饲养、管理和使役，都有很大改进。

二、怎样管理拖拉机、汽车和大型农具？他们实行了“包机到人，单机核算，联产计酬，超产奖励”的办法。如十辆大队拖拉机包给机手个人经营，降低了成本，每亩机耕费由一元降到0.8元。

三、中、小型农具如何管理和使用？犁、耧、耙、杖等小型农具作价卖给社员，这笔款存入银行，不许挪用。大胶车、磨米机等中型机具，由生产队统一经营。社员使用，交付费用；如有损坏，赔偿价额。社员使用集体的房屋、机具兴办粉坊、豆腐坊等副业生产，要向生产队交管理费和折旧费。这样做，方便了

大包干后的十个怎么办

——内蒙古托克托县中滩公社的调查

社员生产和生活，避免了集体财产丢失、损坏和浪费。

四、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如何搞？他们采取了“统一规划，统一施工，按受益多少，将任务分摊到户，限期完成”的办法。这样使任务明确，责任具体，效果很好。去年完成了大黑河改道工程38万土方，挖成了一条排水渠和整修清理了支斗毛渠。过去搞水利建设“最难闹”的河上营子大队，他们在下边任务的第二天，就上了一百多个劳力。有的社员连夜赶到工地，很快就完成了承包的任务。

五、怎样机耕和浇水？他们注意了三点：一是土地分配尽量保持过去的成片规划，以利于机器耕作；二是作物种植区域化。播种前，由生产队提出种植计划，经过社员民主讨论，确定地块和作物。各户按集体议定的种植方案办理。实践结果，多数社员愿意按集体决定的计划种植。少数不通的，经过工作，也能通情达理；三是收好机耕费和浇水费。按受益多少，各户分担，先交费，后机耕和浇水。不交费者，不予机耕和浇水。这样既扩大了机耕和保浇面积，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也不欠债。

六、粮食征购怎么办？他们抓住了五个环节：1、春天包地时，就上交粮食任务和粮食品种一定五年不变的包干计划落实到户，使社员知道年终要交多少，

交什么品种、全年粮食作物应安排多少；2、秋后购粮按合同兑现；3、严格征收农业税。按土地包产和上税的要求，应纳多少税，就交多少粮，影响口粮的另给返销；4、因灾减产，完不成合同，需要减免的，必须经全体社员大会讨论议定；5、做好“个别户”的工作。对于极少数手中有粮，又不按合同规定交粮的户，让本人向全体社员说明理由，然后由社员讨论评议。这样做以后，去年全公社的粮食征购任务完成的既快又好，国家下达50万斤的任务，他们上交了73万斤，70%都是优等粮。

七、公共积累怎么提留？按承包土地多少，一年向每个足额包地社员，提留公积金和公益金1—3元。没有足额包地的，可酌量减少提留。

八、三角债债务如何清理？将集体欠国家的一部分贷款，根据社员欠集体的多少，等量转入社员名下，规定五年还清，每年还20%，利息由集体支付；无故不按计划归还者，将每年应还款的利息由社员个人支付；经转账后，集体仍欠国家贷款的，由集体工副业生产收入偿还。

九、怎样照顾五保户、四属户的生活？这些户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或全部承包，或部分承包，也可不包地。不论包与不包，国家和集体对其按政策办

事，该优待多少就优待多少，该照顾的仍旧照顾。

对于承包土地的五保户，不给上交任务，也不提积累，一切产品全部归己。对于不包地的五保户，由队供给口粮，标准不低于400斤。

对于包地少的四属户，口粮不足的，可向生产队交钱买口粮（因为这些户有外来经济收入），不许拖欠、超支。

十、队干部和民办教师的补贴怎么办？实行“大包干”后，干部也包了一份地，在补助办法上，这个公社将过去过的工分补助改为现金补助。每个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会计每年补助不少于200元，生产队长每年补助不少于100元，其他兼职干部实报实销；民办教师除国家补贴外，每人每月不少于30元。补助资金主要来自社、队工副业生产收入，不足部分由集体提留部分解决。1980年，这个公社享受补助的干部比过去减少50%。

中滩公社通过解决十一个问题，降低了生产成本，巩固了集体经济，提高了社员生活水平。去年，全公社的粮食产量比1978年翻了一番，生产费用却降低了12%。1978年吃国家返销粮230万斤，去年上交给国家粮食73万斤。人均收入达到100元。全公社还购置了七台大农业机具和二百多头耕畜。

本报讯 田聪明 王明勤 本报记者 刘云山



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黑龙江省林区发展木材综合利用

做到木材产量调减，产值不减，对国家贡献不减

编者按 黑龙江省林区大力发展木材综合利用，做到木材产量调减，产值不减，对国家贡献不减。这说明在经济调整中林区大有潜力。为了保护森林，发展林业，党中央、国务院已决定逐步调减木材产量，使木材采伐量不超过林木生长量。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发挥林业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保证木材供应？一个好办法就是发展木材综合利用。这项工作做好了，林业就能发展，木材短缺的状况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黑龙江省林区的做法，可供各地林区借鉴。

本报讯 记者谭佩全报道：黑龙江省林区积极贯彻调整方针，在木材产量逐年调减的情况下，大力发展木材综合利用，把过去白白扔掉或烧掉的枝丫、板皮加工成人造板，把小材小料加工成有用之材，顶替木材产量调减的缺口，做到木材产量调减，产值不减，对国家贡献不减。

黑龙江省林区是我国木材重点产地之一。过去长期执行产一原木生产的方针，致使采伐过量，森林资源大幅度下降。全省40个林业局，已有八个局森林资源日趋枯竭，25个局被迫调减木材产量，企业面临亏损困境。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黑龙江省提出林区要把生产的中心转移到以营林为基础，搞好更新造林，实行木材综合利用。这样，既可以减少采伐面积，节约森林资源，又可以增加林区收益，安置待业青年。据统计，全省木材综合利用工厂（车间）已发展到933个，主要产品有168种，总产值达三亿一千六百万元，占林业的24.2%。去年全省林业实现利润一亿二千五百万元，其中由综合利用提供利润就有一亿零四百万元，相当于木材生产利润的1.6倍。

最近，黑龙江省政府在伊春市铁力林业局召开了全省木材综合利用会议，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制订今后三年发展规划，号召广大林业职工拿出过去搞木材生产的劲头来搞好木材综合利用，把这项新兴工业再向前推进一步。第一，

适应发展多种经营新项目的需要

都昌县为社队培养技术人员

据新华社南昌电 江西省都昌县地处鄱阳湖滨，发展多种经营的潜力很大。去年下半年，县政府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确定重点发展珍珠养殖、桑蚕、蘑菇和饲养土鳖虫等多种经营新项目。但由于技术力量薄弱，致使其中一些项目难于开展。

为了解决社队在发展多种经营新项目上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从去年年底以来，县里举办各

种技术培训班，请本地和外地的技术人员和老师傅讲课，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去年11月，举办了蚕桑学习班，为各公社培训了三十多名技术人员。今年3月，又举办了珍珠养殖培训班，为养殖珍珠的重点公社和大队培养了65名公社养珠技术员。随着蘑菇菌种的培养，目前他们又在开办蘑菇栽培技术培训班。在开办技术培训班的同时，县里还围绕着多种经营的新项目，印了珍珠养殖、种桑养蚕、养土鳖虫等技术资料发到所有大队和重点生产队。

随着多种经营技术的逐步普及，多种经营新项目有了发展。到目前为止，全县已做珍珠土鳖近百万只；栽种桑树五百多亩，养蚕一百二十多板。

新华社记者 潘家珉摄



甘蔗高产的广南省顺德县，建立了甘蔗病虫测报站。这个站的工作人员根据条螟的生长规律和特性，在蔗区设点观测，掌握条螟发生的高峰期，及时地向承包甘蔗的社员发出虫情预报，提出防治措施，减少甘蔗的病虫害。

一件得人心的好事

一事一议

安徽省当涂县有十多个农村小集镇。近两三年，随着农村经济开始活跃，这些过去一度冷落的小集镇，逐渐繁荣热闹起来，群众很高兴，但又有一愁。许多小集镇街道年久失修，路面坎坷不平，排水沟淤塞不通，每逢雨雪，到处积水，泥泞难行，群众很有意见。从去年开始，县委、县政府从城镇建设费中挤出七万元，先后拨给黄池、丹阳、乌溪、亭头、薛洋、新市、马桥等七个小集镇整修街道。所在地的公社干部具体组织施工，县基本建设局还派出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各集镇的居民纷纷献工献料，修街补路的热情很高。去年动工的黄池镇的几条街道，现已全部铺好下水道和水泥路面，今

当涂县挤出部分城镇建设经费，改善集镇面貌，这件事做得合时宜，得人心。农村小集镇街道失修，道路难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前些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基层机关团、商店、服务性店铺门庭冷落，甚至还把居住在集镇上的人斥之为“吃闲饭”，要统统赶下去搞农业。集镇建设无人过问，群众发出怨声是有道理的。现在，各地农村集镇正在恢复、发展，对活跃农村经济、文化卫生、安排剩余劳力，发挥着重要作用，再也忽视不得。适当挤出一部分城镇建设经费，整修农村小集镇，是造福群众、方便群众的好事。有条件的地方能这样做，就会受到群众的欢迎。

他说：我看政策变不了，放心大胆干吧！

第二、认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搞好退赔兑现，取信于民。1962年陈家沟大队没收了社员赵芝的椿树、枣树六棵，在划分自留山过程中，经过群众讨论，大队决定退赔，当年兑现。他高兴地说：“如今党的政策真正好。”他分了自留山后，千方百计找到树苗，很快栽上刺槐400多棵。

第三、及时发放林权证。到目前为止，全公社已给所有已分到自留山的农民发了林权证。好多社员把林权证包了一层又一层，象保存“红宝书”一样把它珍藏起来。有个社员说：“私文书首肯官印，别看这块纸不大，这是凭据，今后有个风吹草动也不怕了。”划分自留山以后，大石庙公社及时制定出台经营好自留山的奖惩办法。规定：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在自留山上栽足树木，保我保活，缺苗即补；凡是栽足而且成活的，第一年每亩自留山生产队奖励三个工，栽不足或不保活的，每年每亩罚一个工，直到全活为止；自留山长期归社员使用，只准造林，不准种庄稼；自留山离耕地5米以内不准栽植树种树。社员说：这件事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又给山，又给苗，栽活了苗木不要钱，还发给工分，谁不好好栽树呀！

本报记者 郑居民
本报通讯员 迟兰馨 郭成群 王连奎

新社会的新事多，三中全会以后的喜事多。就说我家的烧火灶吧，一次比一次高级、新式。

从前，户户用的烧柴灶。每日三餐，我们妇女围着灶台转。一会儿在灶边掌锅铲，一会儿慌里慌张跑到灶门口，一手塞柴，一手擦汗。有时一股浓烟滚出来，呛得人连声干咳眼泪流，一不小心还要烧焦头人和眉毛。我们埋怨柴不好烧，男人还叹气说：“一天起早贪黑，还难得弄到一担柴呀”。

三中全会以后，县委、公社委给我们办好事实，户户改烧柴为烧煤，每月按人供应，还实行减价优待。从此，户户打了一新灶——烧煤灶，把我们家的烧火灶，烧煤，把我们妇女从烟雾弥漫中解放了出来。

烧煤虽比烧柴好，可是，本地不产煤，要从外地运，交通又不方便，经常供不应求。正在我们为难的时侯，县政府又派人来帮助社员用水泥建成沼气灶，用沼气煮饭炒菜。这样，我家在今年4月初，有了一个沼气灶，打了两只新灶——沼气灶。一家六口人的饭，用不了半点钟。点火快，熄火快，好控制，又卫生，又省钱。由于杂草、粪桶在池里发酵，肥效提高，下田田苗，喂鱼色好。沼气灶经久牢固，只要管理得好，恐怕我这辈子还用不了，要做传家宝，留给下一代人。

党和政府为我们做的好事，一件比一件称心。对家里三口灶，一口比一口巧。想想今后的生活，一定会芝麻开花，一节更比一节高。

湖北通城县唐桥公社下七队 黎银凤

邮车开进水乡

地处苏北里下河芦荡水乡的盐城县楼王公社，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过去，这里的报刊都是靠每天一班轮的轮船从县城托运，群众看到的往往是三、四天前的报纸，新闻成了旧闻。

去年年底，公路修进了芦荡水乡。正式通车后，县邮电部门专门增设了一班邮车，运送报刊。现在清晨六时许，邮车就来到这个离县城近百里的水乡小集镇，从不同断，群众每天上午就能看到隔日的《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和当地的《盐东大众报》了。

薛 强



农村新貌

用政策调动社员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承德市大石庙公社划分自留山的调查

河北省承德市大石庙公社是个郊区公社，总面积15.4万多亩，耕地只有1.8万多亩，人均不到一亩地。公社的山场较大，宜林荒山和荒坡7万多亩，有近3万亩没有绿化。全公社5,966个劳动力，常年用于农田和工商业的约4,000人，剩余劳力近2,000人。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逐步完善，估计明年剩余劳力还要增多。为了加快山区绿化速度，为剩余劳力找出路，公社落实自留山政策，将近山荒坡、沟岔岔划给社员植树造林。

这个公社在1980年1月开始划自留山时，出现过“顶牛”现象。雷神庙大队第五生产队经过民主评议，划给徐振富自留山3亩9分，徐振富坚决不要。划给社员刘自留山的事，他也不要说：“划自留山是糊弄人的事，不知哪天收回去呢！我不白受那个累！”承德市林业处和公社干部在社员和生产队干部中进行摸底，发现社员害怕政策变，不敢要；干部害怕犯右倾错误、不愿划。合作化时，给社员分了自留山。1960年无偿地收归了集体。1963年“四固定”时，又给社员划了自留山，社员种上了树，1965年“四

清”时，又收回了。十年动乱中还把社员房前屋后的树木收归了集体。社员群众说：划自留山有啥用，种上树没人管，大谁都能，不是划归己，就是挨批判。有的队干部对社员业的同志说：你们帮助我们划自留山，你们可是“飞鸽牌”，我们是“永久牌”，到时候你们一拍屁股走了，挨整的还是我们。

为了解除群众怕变，干部怕右的思想顾虑，承德市林业处帮助公社作了三件事：第一向社员反复宣传《森林法试行》和林业政策。通过宣传使干部、群众认识到划自留山不只是加快荒山绿化、增加社员收入的好办法，而且从长远看还能促进农牧业全面发展，保持生态平衡，造福于子孙后代。雷神庙大队的队干部通过深入学习文件，解除了思想顾虑，多次到山场和指定植树地点和社员一起丈量土地，标识立界，登记造册；他们还用广播宣传社员杨芝芳1973年在房前屋后栽的树，今年已长成了檩材，价值近千元的事迹，使很多人消除了顾虑，相信了“谁栽谁有”、允许继承的政策。队里给杨芳喜划分自留山，他在一个星期内就栽上了红果树。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关和直属部队举行大会

欢迎黄植诚起义 宣布任命命令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关和直属部队今天上午举行欢迎黄植诚驾机起义和宣布任命大会。

大会会场里挂着“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祖国大业而奋斗”的巨幅标语。大会开始时，在欢快的欢迎曲中，两名少先队员向黄植诚献花。全场热烈鼓掌。黄植诚挥动花束向大家致意。

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在会上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关任命黄植诚为空军某航校副校长的任命命令。

空军政委高厚良在讲话中，代表空军领导机关和空军全体指战员对黄植诚驾机起义归来和加入人民空军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祝贺。他说，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的感召下，黄植诚带着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毅然摆脱台湾当局的控制，驾机起义，回到祖国大陆。他的这一行动，充分说明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共同愿望，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他希望台湾当局能够从黄植诚驾机起义的爱国行动中作出反省，认清形势，正视现实，尊重人民的意愿，响应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常委要求和平谈判统一祖国的正确主张，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做有功于国家、有益于民族的人。

原国民党起义人员代表徐延泽在讲话中说，我曾在国民党军队里生活了18年，饱尝了国家内战和分裂的痛苦。起义回到祖国怀抱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十分信任和关怀，使我从一个国民党空军的旧军人成长为人民空军航空学校的副参谋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选举为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参与管理国家大事。我在人民军队中也生活了18年，前后两个18年使我深深体会到，共产党好，人民军队好，社会主义祖国好。

黄植诚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今天，我在这里参加这个隆重热烈的欢迎大会，心情非常激动。8月12日，在福建前线军民欢迎我的大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宣布准许我参加人民空军，我成了一名革命战士。大家亲切地称我“同志”，我感到格外高兴。现在，张司令员又宣布了我的任职。今后，我将和大家一起，为祖国的强盛，为空军的建设而作出贡献。我一定不辜负祖国和人民对我的关怀与期望。

空军机关和直属部队干部战士代表三千五百多人参加了大会。



黄植诚在空军领导机关和直属部队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新华社记者 吴森辉摄

滚雪球的方法可借鉴

今年上半年，徐州市委在贯彻中央文件的过程中，先由市委举办训练班，轮训各区局分管政工的党委书记、宣传科长、组织科长、纪委书记。这些骨干回去以后，纷纷仿照市委的做法，办起了轮训班，使全市基层政工干部普遍受到一次短期训练。他们把这种方法叫做“滚雪球”。

“滚雪球”，在当前学习《决议》中，也可以借鉴。徐州市的“雪球”能由小到大地滚起来，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关键在于市委领导同志对中央文件有个积极的态度，他们亲自上辅导课，带头讲道理、谈体会，清理“左”的思想，用党的三中全会的指导和路线方针政策来统一大家的认识。市委领导以身作则，政工干部认真负责，群众自然就会跟上来。

十年浩劫期间搞的那一套形式主义的学习方法，群众早已厌倦了。有些同志中滋长了一种不爱学习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领导者，先要自己学好，又要抓好群众的学习。如果自己松散散学，满足于订了学习计划，作了学习动员，然后撒手不管，那样“雪球”是不会自己滚起来的。理朴

艺术的生命在创新

前两年，有幅摄影作品叫《悄悄话》，被评为优秀作品。图面上，一个孩童对另一个孩童神秘地耳语，取材别致，构图新颖，富有艺术魅力。然而，它一出现，就引来了许多同类或类似的作品。有中国画的《悄悄话》，有木雕的《悄悄话》，歌词也有《悄悄话》，形式尽管不一样，内容却大同小异，不外乎一天真可爱的女童对爷爷或妈妈的“耳语”。

艺术的生命在创新。只循前人之辙，跟着别人的脚印走，怎么能称之为创作呢？要使自己的作品受到群众的欢迎和赞赏，就得进行生动的深入的艺术创造，否则，落俗套的作品，群众是不会欣赏的。 吴 锋



邱海仔惜粮如金

邱海仔所在的苏村粮站靠山旁，山泉流水威胁着粮仓安全，邱海仔和职工们把横贯仓库的水沟填平，并在仓库周围挖了新排水沟和二口水池，把泉水引进池内，防火用水都很方便。为了提高粮食保管质量，他们在仓库顶上搭起了天花板，铺上了油毛毡；把仓库地面做成了干燥、硬化的泥地。在苏村粮站，邱海仔既做木工，又当泥瓦匠，从早到晚闲不住，光是砌水泥的铁刀在他手头上就磨掉了五把。就这样经过邱海仔和职工们的辛勤劳动，使一个柱坏梁霉、破烂不堪的民房仓库焕然一新，为国家节约修理费三千三百多元。

邱海仔一心扑在保管粮食工作上。进仓的粮食，他一定要把泥沙杂质等处理得干干净净；发现粮堆上有老鼠，邱海仔就蹲在那里，仔细观察老鼠的行踪踪迹，掌握老鼠活动规律，想方设法消灭。有一年，他从新入库的粮食堆里突然发现了几条谷蠹虫，这种虫繁殖快，吃谷凶猛，如不及时清除，整个仓库的粮食都要受损失。他立即组织职工一起，不分昼夜，不停地筛谷除虫。经过一个多月的辛勤劳动，邱海仔和两名职工硬是将四十三万余斤谷子筛完了，清除了虫害隐患，保住了国家粮食。

一个铁匠主动为邱海仔打了一把上等锄头，然后要求邱海仔私自卖给他二百斤粮食。邱海仔果断地告诉他：“桥归桥，路归路；打锄头给你钱，买粮食没有国家指标办不到！”铁匠没有办法，骂他是一块“死铁”——不通情。又一次，一位粮站业务员多卖给一个社员一百斤没有供应指标的粮食，邱海仔发现后，扣回了一百斤粮食指标，并且教育职工和社员要遵守国家规定，按照国家计划供应粮食，使大家心服口服。苏村粮站年年被评为县粮食局先进单位。邱海仔也多次被评为省、地、县劳动模范。本报记者 王绍业 熊典达

黄植诚说他选择的道路完全正确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黄植诚今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关和直属部队欢迎他驾机起义归来和宣布他的任职命令的大会上说：“回祖国大陆，是我久已向往的事。我选择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他说，他在台湾生活了29年，在国民党空军里干了12年。由于台湾当局长期时期地封锁大陆的消息，作了许多不实宣传，使台湾人民无法正确了解大陆的情况。他说，但是他从外国杂志上，从大陆的空飘气球送到台湾的传单中，从大陆电台的广播中，了解到大陆的一些真实情况和大陆的政策，使他认识到台湾当局是在对台湾人民进行欺骗。

黄植诚说，台湾缺乏资源，资金也不足，一切依赖进口，依赖外国的投资。台湾的一条高速公路是借外债修起来的，所以收费一涨再涨。台湾的一些轻工业产品靠外销。当

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景气，严重影响着台湾，物价飞涨，经济呈现暗淡景象。台湾的社会风气糜烂。在这样一个腐败的社会里，一些青年人迷惘、苦闷、沉沦，另一些人却在痛苦地思索。

黄植诚说：我常想，我们的祖国是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文化的国家，国土那么大，人口那么多，物产那么丰富。我们应该富强，应该振奋。祖国有伟大的潜力，祖国未来的发展是无限的。我暗自下了决心，决心飞向光明，早日飞回祖国大陆，把我的青春热血、知识才能贡献给祖国。我知道要飞回大陆，自己要下很大的决心，因为在台湾岛上有我六十多岁的慈颜老母，又重情深的哥哥、姐姐，还有许多情同手足的同学、同事，再说，回来时也要冒着生命危险。可是，当我想到祖国，我就有了很大的勇气和力量。



陈文成的妻子陈素贞发表声明

不接受台湾当局对她丈夫死因调查结果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据合众国际社报道：

台湾旅美数学博士陈文成的妻子陈素贞在16日回到侨居地美国匹兹堡时发表声明说，她不能接受台湾当局对她丈夫死因的调查结果。

据报道，陈素贞在声明中说：“我断言，我不能接受他们（指台湾当局）

的结论所说的他的死是由于自杀或是意外。”声明表示希望台湾当局重新调查她丈夫确实的死因。

陈素贞与她刚满周岁的儿子是在14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台湾的。和他们母子同行的还有陈文成的妹妹陈宝月。



李先念会见加拿大外交部长马克·麦圭根及其一行。

林乎加宴请斯里兰卡农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农业部部长林乎加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农业发展和研究部部长森纳那亚克率领的斯里兰卡农业代表团。

席间，林乎加同森纳那亚克亲切交谈，相互介绍了两国农业生产情况。

振兴农业的新课题

（上接第一版）

要通过农工商综合经营，探索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适当形式。长期以来，“党政企不分”，使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属品，单位不能按照经济规律和“权”、“责”、“利”相结合的原则，自主地管理自己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农工商综合经营，通过经济联合的办法，把基层生产单位办成真正的经济企业，它将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农村经济探索出一种切合实际、有利生产的形式。这项有关体制改革的大事，目前只能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选择一两个、两三个进行试点。摸索要循序渐进，不要随意在面上铺开，不要刮风。

农工商联合企业要立足于开发利用当地资源，搞好多种经营，增加农副产品品种和数量。自身拥有可靠的原料，扩大加工工业和销售市场才有牢固的基础。要抓产品加工，逐步拥有自己的加工手段。如果没有工业能力，就会始终处于提供原料的地位。联合企业的商业搞活了，整个企业经济就可以搞活了。

量。

他说：“这十几天来，我的心情一直很激动，我见到了许多高级长官，接触了许多同胞，游览了名胜古迹，受益非浅。这次来京，经过了7个省、市、北国江南，到处是一片繁忙的生产景象，纯朴的民风，使我大开眼界，耳目一新，觉得祖国真是伟大可爱。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两个社会有很大的不同，我选择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黄植诚说，台湾与祖国大陆已经分离了三十多年。只要有国家民族意识的中国人，都非赞成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早日实现统一。他说：我从福建到北京，所到处之所接触的人群，我感到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和信念，那就是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台湾海峡两岸的亲人，一个心愿——求团结、求统一。我觉得，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大业，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祖国政府早已提出一系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片诚意，台湾当局应该作出积极的响应。

支持少儿文化教育事业 东方歌舞团在北京义演 刘英同志捐献存款四万元

本报讯 8月17日晚七点半，东方歌舞团在北京展览馆举行义演，将这场演出的收入，捐献给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演出时，王昆同志主持了演出并报幕。张燕、远征、朱明珠、郑绪岚、牟炫甫、索宝莉、齐世杰、汪永生、阿布力孜等都演出了十分精彩的节目，他们用自己的歌声、舞姿和优美的器乐表演，表达了对少年儿童的爱和关心。

本报讯 6月15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刘英同志致信康克清同志，主动捐献四万元存款，支持少年儿童文化教育事业。信中说：“最近，中央书记处作出关怀少年儿童成长的决定，我表示衷心拥护。为响应党中央号召，支持少年儿童文化教育事业，我将历年工资积存四万元（存折两张）捐献出来，希望作为少年儿童文化教育事业的基金。虽然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不过借以表示我对党的这一号召和少年儿童教育事业的这一点心意而已。”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宏伟画卷

《上海的早晨》四卷今年出完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周而复创作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被赞誉为中国文学本家的写真，社会主义改造的生动画卷。这部170多万字的巨著在“文化大革命”前出版了第一卷和第二卷，后来被“四人帮”诬为“大毒草”，连同它的作者遭受了不白之冤。冤案平反后，作者整理和写出了续篇，并于今年将全部四卷出版。

评论界人士指出，《上海的早晨》是继矛盾的《子夜》以后又一部反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命运的杰作，艺术地再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

中、加外长继续会谈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农业部部长林乎加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农业发展和研究部部长森纳那亚克率领的斯里兰卡农业代表团。

席间，林乎加同森纳那亚克亲切交谈，相互介绍了两国农业生产情况。

舒赖基大使举行宴会庆祝叙中建交25周年

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驻中国大使扎卡里亚·舒赖基今晚在大使馆举行宴会，庆祝叙中建交25周年。

外交部副部长张灿明、对外文委副主任王闾西等应邀出席宴会。

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通过地区协作同国营工业和国营商业挂钩，进行互相有利的加工和购销活动。总之，从原料、加工到销售，联合企业要增强自己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农工商联合企业内部，要实行民主办企业。对参加联合的单位，坚持自愿互利原则，不能搞强迫。根据联合各方的特点，扬长避短，发挥各自的优长。要妥善处理利润分配，给参加联合的群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利益。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兼顾国家、企业、生产者、消费者四者的利益。在保证国家财政增收、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把企业统一经营产品的利润大部分返还给基层农业生产单位，这实际上是协调农、工、商三者利益，逐步解决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的办法之一。

农工商综合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我们对它不熟悉，还缺乏经验。各级领导要扶持它、鼓励它、积极地领导它。对试点工作，只要有利生产，有利国家和群众，就应当给它开“绿灯”，在具体问题上采取一些灵活变通的办法。各种形式都允许试验。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成功和失败的教训都要总结，变成共同的财富。让“农、工、商”这一新生事物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壮大起来！

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刻

杨国宇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以后，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和我党的推动，国民党不得不同意与我党联合抗日。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在1937年8月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将在陕甘宁边区红军的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115、120、129三个师。129师由刘伯承同志任师长。稍后，邓小平同志任政委。

面临这一转折，很多同志思想上一下子转不过弯来。

我当时在司令部工作，对改编之事早有耳闻。我和同事议论过：“改编后，谁来领导？国民党会不会借机整我们？”

这些想法，也是杞人忧天。刘伯承师长见我心情忧郁，就问：“你是不是也想不开了？”我讲了我的疑虑后，他说：“我们名义上叫八路军，实际上还是红军，仍然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师长还认为，象我这样的担心是比较容易解除的。不大好解决的是干部战士中的不理解情绪。

当时许多同志就打内战强辩：

“参军就是为了打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我们也成了国民党军，有这样革

命的吗？”

“蒋介石多次围剿我们，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我们损失那么大，这仇能忘了吗？”显然，如果让这种情绪在部队中蔓延开去，对抗战是不利的。

在正式宣布改编前的一天晚上，刘伯承同志亲自给干部战士作动员报告。司令部的一位同志站起来激动地说：“我宁可回国家当农民，也不穿国民党军装，戴青天白日的帽！”刘伯承同志批评说：“意见可以讲，但军人不能不遵纪！”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我也不愿穿国民党的军装，但是，大敌当前，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抗日。不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我们就不能生存。都回国家，谁去打仗？要识大局，不能因个人好恶，而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

动员大会开过后，刘伯承和其他领导同志分头到直属队干部战士一起讨论。讨论中，大家还联系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的消息传来，大家兴奋得不得了。有的说：“我们捉了十年也没捉到蒋介石，这回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捉住了，可能不能让他跑掉！”后来听说，我们党派周恩来同志亲自谈判，决定不杀蒋介石。开始大部分同志思

想不通，后来，才明白放蒋是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的建立。回顾这件事，对我们的启发很大。

经过一系列的说服教育工作，指战员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相信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应该坚决执行。在这基础上，八路军129师于9月6日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召开了奔赴抗日战场的誓师大会。这天，下着雨。近人们的队伍整齐地排列在旷地上，一眼望去，五星帽徽在纷纷的雨雾中格外醒目。

雨，越下越大。一位参谋见刘师长的衣服被雨水淋透了，悄悄从背后给他披上雨衣。刘师长顺口问道：“你知道‘冬不服裘，雨不张盖’吗？”这位参谋领会了，马上将雨衣收走。刘师长接着说：“我过去同你们一起打蒋介石，现在我同你们一道抗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现在下雨，大家一起熬熬。”

刘伯承同志重讲了“换帽子”问题：“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换帽子算得了什么，那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传统不会丢，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不会动摇！那帽徽是白的，可

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讲到最后，他紧抿着嘴唇，停顿了一下，用低沉的声音说：“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告别吧！”他说罢，缓缓地从头摘下红军军帽，戴上了国民党的灰色军帽，然后果断地向全指战员发出命令：

“现在，换帽子！”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我的心情很矛盾。欢乐，为能够立即上前线杀敌；痛苦，为戴上了灰色的军帽。……我环顾四周，见大家都同我一样，小心翼翼地把缀有红五星的红军帽揣进怀里。会场静极了，没人言语，只听细雨沙沙……

我军的改编也影响了人民群众情绪。许多老百姓也怀疑我军的性质，甚至有的惊慌失措，说什么：“名称改了，服装也换了，歇着吧，跟着就会同国民党军队一样，抓丁拉伕，打人骂人啦！”

刘伯承师长认为，过去红军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只要我们去主动地向他们宣传我军一贯主张，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仍是人民的子弟兵，就能很快地消除他们的误解。

我指战员采取与驻地老百姓谈心、贴标语、召集群众大会等方法，开展了宣传活动，并为群众做好事，扫院子、打水、干农活，不侵犯群众的利益，效果很好。

我曾对房东大嫂说：“听说很多老乡对我们怀疑了，我真急啊！恨不得把胸膛扒开，让他们看看，里面的心是红的，还是

黑的！”

大嫂笑了，说：“我就知道，你们仍会和先前一样。要不，那天领回那么辉煌的军官服，怎不见你穿，也不见别的官兵穿呢？倒是让那些娃子兵和大师傅们穿戴上了，没人当它作什么好玩玩意儿！住在我家的那个高个子（指刘伯承同志），数他官最大，可他还穿着带大丁的裤子。看来看去，你们还是穷人的队伍！”

当我们129师接到总部命令，准备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时，群众已经完全打消了顾虑。一位老太太见部队住过的房屋，门板都上了起来，地面扫得干干净净，桌椅板凳归置得整整齐齐，还有因为打碎了老乡的瓷碗而留下的道歉款子和赔款，激动地对她原来持怀疑态度的老伴说：“你看看，这样的军队能变吗！”

我军开赴抗日前线时，工人、农民、商人和学生纷纷送来锦旗，期望我军英勇杀敌。沿途的村镇，老百姓有的端开水给我们喝，送糖果和油炸果让我们尝，有的还拴着往我们的口袋里塞鸡窝、馒头……。所有这些，使指战员深受感动，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我军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历史证明：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我军都能够坚定同人民站在一起，为祖国的解放和建设努力奋斗，而人民群众总是信赖和支持自己的子弟兵的。

（《星火燎原》编辑部供稿）

重返皖西的战斗

郑国仲

1947年夏，解放战争刚进入第二年，我刘邓大军奉命转到外线作战。6月30日晚，千军万马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那时，我在三纵任副司令。我纵渡黄河以后，在野战军首长统一指挥下，先在鲁西南转战28天，最后一战，协同兄弟纵队围攻梁山寨，歼灭整编六十六师。尔后，为了及早调动敌人，便于粉碎蒋军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又于8月7日黄昏，乘胜南进，越过陇海，进军中原，直捣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心。8月23日，纵队又强渡了南下最后一道险关——淮河。

重返皖西苏区

渡淮河后第三天，解放了豫南固始县城。部队在固始集结待命之际，传来了刘邓首长的命令，说：我们已经到了大别山，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下一步，要我们和兄弟纵队迅速向皖西和鄂东地区实行战略展开，以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分遣兵力发动群众。同时还强调指出：对渡过淮河23个县的敌人，有其他纵队去对付，要我们战胜困难重建和巩固大别山根据地。纵队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纵队陈锡联司令员等率八、九两旅直插六安、舒城、桐城；另一路则由我率八旅经金家寨，直插霍山、岳西，共同挺进皖西，逼进长江，威胁南京。

我们这些鄂豫皖的红军战士，有的在皖西转战过，有的家乡就在那里，听说重返皖西，重建根据地，感到格外亲切和兴奋。这个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这里的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当年，鄂豫皖红军在这里诞生、发展、壮大；以后，新四军五师又在这里建立了中原抗日民主根据地；五师撤离后，留下了不少游击武装，在这里坚持斗争。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发动内战以来，我军又来到大别山区。

我们走一路，人民群众欢迎我们一路。路旁树上、村屋墙上，贴着一张张红绿纸写的标语：“欢迎老红军回来！”“欢迎解放军大军！”看着欢迎的人群，就使我想起过去苏区人民支援红军的情景：青年参军参战，老英雄献寿，妇女忙着煮春饭。今天，我们重新回到这里，人民群众欢迎子弟兵的这种鱼水之情，和我们盼望重归父老的心愿，如胶似漆地交融在一起。

我们进霍山的第二天，山上游击队就派何德庆等同志来和我们联系。这时，正好纵队副政委周洪德同志也来到霍山，向我们传达党委决定，要我带九旅二十七团，到霍山以南岳西地区建立纵队后方基地。我们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何德庆等同志。他们讲了很多有关敌后斗争如何艰苦斗争，人民群众掩护保护他们的种种情景。我和副政委也把毛主席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精神，还有野战军领导同志讲的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向他们仔细说了一遍。大家都感到莫大的兴奋和鼓舞。

小河口伏击战

我们在岳西包家河、杨家河一带，把纵队一些轻重装备安置在山里，因敌人来得快，后方基地也没有来得及搞起来。

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是：我要立足扎根，而敌人妄图把我赶出大别山区。刘邓首长指示我们，敌人的手很大，可以抓住机会开它。只要我们有意思想准备，打它几个回合，我们就可以站稳脚跟。纵队党委也根据当时形势，向部队发出“把大别山变成太行山”的口号，要求部队大打出手，打好仗。

9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活动来到桐城和潜山之间的小河口中麓村，得悉敌人一个师要经过这条公路。当时，该师一个团伸出师部比较远，这是我开敌的一个良机。我要八旅派一个团埋伏在靠小河口的山村中伏击敌人，给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受命担任伏击的是二十四团，团长涂学志是一员勇将，部队的战斗情绪很高，战士盼望早日为父老乡亲们报仇。有这样的指战员和部队，打仗仗是有把握的。但面临着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作战。这同华北太行根据地就不好比了。在那里，仗还未打，粮食已到了；仗打起来，出发有人带路，弹药有人搬运，伤员有人护送，地方有兵站，部队有医院，真是有啥有啥，毫无顾虑。可是现在，局势还不稳定，在与敌周旋当中，常常是我来攻退，敌占城，我占山，群众心惶惑不定，怕我们呆不住，扎不了根。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新区

的群众受国民党欺骗深，怕接近我们，一见我们就躲就逃，就是老苏区的一些老乡也受国民党的威胁排挤，怕国民党反动军队再来屠杀他们，有时连个向导都很难找到。战士爬山没有鞋，饭菜不能吃，吃粮现征现买现碾，“弹药库”随身背，轻伤自己走，重伤自己抬，既无随军野战医院，更无巩固的后方安置。在这种情况下打仗，作为一个指挥员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为此，在战斗打响以前，我再三交代涂团长：不能恋战大打，只能小口小口吃，狠狠敲一下，抓一把马上走回据，要尽力避免自己伤亡。

上午，敌人戒备松弛地由太湖经潜山往桐城而来。等敌人进入我预计地区时，部队如同猛虎下山，迅速从隐蔽的山丛中跃出，冲入敌群，不多一阵工夫，敌人先头一个营已解决了，抓了很多俘虏。战士们把一伙一伙俘虏兵都锁在路旁几个空屋里，把他们的枪支弹药卸了下来，有用的就补充自己，留作下次战斗用。这种“以战养战”，在当时确是“无后方作战”的好办法。

涂学忠眼见很快开敌一个营，敌人已溃不成军，纷纷夺路逃跑。这时，他的“杀敌”上来了，就把我们战前计划全忘了。他指挥部队追歼敌人。这时我担心后面敌部率两个团赶来，打下去对我们不利，就要通讯员赶快通知涂团长停止追击，迅速撤出战斗。

敌人很快逃得不见踪影，涂团长也马上收拢部队回撤。我们已向八旅干部交代，要他们向霍山、岳西方向转移。我在地方干部的安排下，隐蔽在岳西一个二、三户人家的山里养伤。那几家都是我们地下党的基本群众，所以我在那里养伤很安全，吃得好，休息得好，我左臂的枪伤很快就愈合了。那里的地下党同志，对我关心也无微不至，经常派人来看望，一有什么情况，马上就派人来通报，并且还周密布置了种种应急的转移准备。那时我想，不是对我格外优惠照顾吗？过后了解，有些重伤员经地方安置在老乡家养伤的都得到非常好的照料和关怀。这是皖西苏区人民的光荣传统。他们爱戴自己子弟兵的那种深情厚意，我永远不能忘怀！

张家店歼灭战

9月下旬，我伤愈后回到八旅。这时，七旅、九旅连克六安、舒城、桐城等县后，已转移到豫南商城、潢川一带。随着我军在大别山区的连续胜利，直接威胁着南京、武汉，吸引蒋介石从山东等战场抽调来“围剿”我军的兵力也愈来愈多。进入皖西之敌，乘我们纵队主力西移的时机，乘虚而入，一路直占六安等地，另一路连侵我舒城、桐城、太湖、潜山。正当敌情日益严重，我军又处于没有后方，生活艰苦，部队减员，作战困难的情况下，野战军党委立即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增强积极开战的志。部队的精神振作，纷纷掀起杀敌立功的竞赛。

国民党部队一进入皖西，他们就抓住入侵桐城的这一路分散孤立之敌。这股敌人是蒋军整编八十八师师部和它率领的主力六十二旅。这个旅是蒋军嫡系，大部美式装备，受反动教育较深，有一定的战斗力，而且善于防御作战。1947年初，我野战军第二次出击陇海线，在巨（野）、金（乡）、鱼（台）战役中，我们纵队在鱼台西北就全歼它一个团，兄弟纵队也歼它一营，六十二旅被打得狼狼逃窜，慌忙缩回到徐州一线。现在经过重新补充和训练，卷土重来。我们得把情况查明以后，及时报告野战军和纵队。

后来，我与八旅几个干部又对六十二旅的活动，不断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它虽然气势汹汹，连占我主动让出的城镇，但它受过我军打击，心有余悸。从各种征候判断，敌主要企图是乘虚占我城镇要道，重新控制皖西，而不想找我主力决战。我们要在皖西站稳脚跟，就必须歼灭这股进攻之敌，它孤军深入，正是我们一举歼灭的好机会。但是，我们考虑到，要歼灭这股敌人，一个旅的兵力是不够的。于是我们决定向野战军和纵队建议：集中我纵主力，抓紧战机，歼

灭敌人。很快，我们就接到了刘邓首长的复电，告诉我纵：“东敌西调，迅速回皖西，歼灭分散薄弱之敌。”

在我纵主力回师途中，敌人又从舒城西进，妄图侵我霍山。10月7日，八旅组织小部队在舒城以西的南官亭附近，对敌最后部队实施侧击。敌虽受我尾击，因不明我意图，仍不顾一切，继续向西进犯。此时，我纵队主力经七昼夜连续行军，已到达霍山东北北河附近待机。深夜，西线之敌与我回师的九旅先头部队接触之后，发现我主力赶到，感到不妙，就慌忙回窜，龟缩到柏儿岭一带。正当我们调集兵力，布置对敌合围时，狡猾的敌人于8日拂晓又开始向北退却。敌人的行动，更证实了它畏首畏尾，不敢与我决战的分析。于是，我立即发报向纵队首长建议，组织兵力追歼敌人，同时八旅继续跟踪追击，死死咬住敌人，决不让他跑掉。

天黑以后，仓皇逃窜之敌见左右两侧有我部队平行推进，尾部又有追兵，眼看难以逃脱，就全部猬集在离六安50多里的张家店。敌人停下了，我们没有停。七旅二十团迅速回到张家店北面，抢占了几个山头，堵住了敌人北逃和南援的道路；九旅先头部队也向张家店西南两面急进，占领外圈高地；八旅则直插北面，控制有利地形。

被困在张家店之敌，拚命垂死挣扎。天刚破晓，他们就选择北面为主要突击方向，以整连、整营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对我阵地猛扑，妄图夺路向六安窜逃。我先头部队坚守阵地，一次又一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刚赶到战场的后续部队也先后展开，从翼侧向敌主动进攻，使敌多方受击，有效地制止了敌人的突围。

正在激战的时刻，我和八旅干部也赶到张家店，登上南面的一座小山，观察敌情。当我见到部队的

杨献珍同志来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1981年5月19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有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的哲学工作者卢国英、叶佐英合写的《党的卓越哲学家艾思奇》一文，文章中说：

“1953年，陈伯达主持马列学院工作时，组织批判《大众哲学》，下令禁止出版。1958年，陈老康丰铁砍直接插手哲学教研室反右派运动，发动贴他的‘大字报’，并组织大小会议围攻艾思奇。后又借机要他带病下放进行‘惩罚’。”

从历史事实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唯物史观的原则，对任何人和事，要进行历史的分析，用事实说话，分清是非。

请看历史事实：从1948年马列学院成立到全国解放初期，刘少奇同志任院长、陈伯达任副院长（从未当过院长）。1953年初，中央任命凯丰同志为马列学院院长，杨献珍、侯维桐同志为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这时，刘少奇同志不兼任院长了，陈伯达也不兼任副院长了，说“1953年，陈伯达主持马列学院时，组织批判《大众哲学》，下令禁止出版。”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1953年8、9月间，马列学院党委确实曾有过一次对艾思奇同志错误的哲学观点进行批评，但那时

陈伯达已离开马列学院很久了，所以批评艾思奇同志的事，与陈伯达无关。那么，马列学院党委为什么要批评艾思奇同志呢？

原因是这样：1949年春，马列学院随同中央迁往北京以后，艾思奇同志在院前和外院讲哲学时，确实发生过一些原则性的差错。例如，1953年8月，一次他在马列学院讲哲学时，讲到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时，他举例说：“毛主席成为中国人民领袖是个偶然。”听课的学员深为不满，在课堂上即提出抗议。院党委认为有必要对艾思奇同志进行必要的批评与帮助，于是召开了

一个党委扩大会议，吸收各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参加了会议，马列学院第一部主任胡绳同志也参加了会议。批评的主题是关于艾思奇同志的某些错误的哲学理论观点，也联系到批评他的《大众哲学》一书中的一些错误。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帮助，是党内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主持会议的是副院长杨献珍和侯维桐同志。院长凯丰同志因病卧床，未能参加会议。在会上，艾思奇同志也作了自我检讨，他在检讨中说：

“今后要以严格的精神和对待同志，对同志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尽可能制造好的成品，坚决制止推销劣品。《大众哲学》永远停止出版，并对读者作公开声明。”会后，院党委根据大家的批评意见作了一个总结，题为《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学院委员会关于艾思奇同志过去在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的检查报告》，连同艾思奇

同志自己写的《我的工作检讨》，报送中央马列学院管理委员会审批。当时，管理委员会主任胡乔木同志口头指示我们，只在党委和参加会议的同志中间传，不必往下传达。至今这两个文件还保存在中央党校档案室里。

关于1958年高级党校哲学教学人员整风反右和下放河南的事，情况是这样：

1958年上半年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整风时，艾思奇同志在青岛休养，根本没有叫他回来参加整风，更没有谁贴他的“大字报”，没有谁“组织大小会议围攻艾思奇”。这是1958年上半年的事。

1958年8月下旬，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从北戴河打电话来，说中央决定，高级党校下半年不开课，要各地的学员留在原地参加大跃进，在实践中学习大跃进。党校教学人员分别下放到工厂或农村，也在实践中学习大跃进。哲学教研室的同志去河南学大跃进。那时，艾思奇同志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健康，他高高兴兴地带领哲学教研室的同志去了河南，卢国英、叶佐英同志硬要是说“后又借机要他带病下放，进行‘惩罚’。”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历史是不能篡改的，我们应当尊重历史。我要将我这一封来信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以正视听，可否？请定夺。

即颂

撰安！

杨献珍

1981年5月27日



